

金融地理结构、银行竞争与营商环境

——来自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和企业失信的经验证据*

戴美虹

内容提要:新发展格局下注重营商环境的优化,其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但少有文献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对社会信用的影响。本文聚焦于微观层面企业失信问题,首先理论阐述了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效应。其次,基于中国2001—2013年微观数据证实了研究假说和推论:银行竞争能够降低企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概率,增强企业信用,且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是银行竞争增强企业信用的作用机制。变更核心变量测度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说明:儒家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同样有助于增强企业信用;银行竞争亦有助于增强商业信用、提升企业金融负债能力。本文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微观证据,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新启示。

关键词:金融地理结构 银行竞争 社会信用 企业 营商环境

作者简介:戴美虹,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116025。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2)05-0066-1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跃居第31位,已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其中,信用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信用几乎构成了所有经济交易的基础,不仅能够影响交易规模和经济活动效率,而且具有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对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做了明确部署。制定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0月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口企业集聚对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基于近邻异质性和企业内资源重置的研究”(71903023)。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戴美虹电子邮箱:widelia.dai@163.com。

公布与查询”平台,并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失信惩戒,^①从此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规范手段由原先的道德谴责等非正式制度上升为强制执行的信用惩戒的正式制度(余泳泽等,2020)。

如何增强社会信用?学界有关信用与交易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陈颐,2017)。目前,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信用的经济效应进行讨论。在宏观层面,增强社会信用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Knack 和 Keefer,1997;吕朝凤等,2019)、提高社会福利(Helliwell,2003)、改善法制和政府管制(La Porta 等,1997)。在微观层面,信用增强有助于提升企业融资能力(Gupta 等,2018;戴亦一等,2019)以及成长潜力(余泳泽等,2020)。然而,既有研究较少讨论社会信用的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出发,聚焦于微观企业信用层面,旨在探究银行竞争对企业失信的影响,以期增强社会信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新思路。一方面,中国金融地理结构基本上可以由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决定(蔡庆丰等,2020),而商业银行网点布局能够反映银行竞争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实现了从一元银行体制到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建立转变(许和连等,2020),以高度垄断到竞争不断加剧为重要特征(姜付秀等,2019)。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银行业主要由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构成,到 1987 年第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创立,再到 21 世纪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与银行上市热潮、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大幅放宽银行准入条件、^②2014 年民营银行试点创立,都体现出中国对银行市场竞争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既有研究亦为不断加深的中国银行竞争程度提供了微观证据: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和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布局分析,研究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企业到最近的银行分支机构的平均距离从 8.77 公里缩短至 2.40 公里,以企业周围 10 公里半径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平均数量来看,由 40.89 家增长到 151.01 家(李志生等,2020)。另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包含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个层面(Osei-Bryson 和 Ko,2004),本文聚焦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本文中企业信用刻画的是企业在债务到期日如约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信用缺失实质上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赵驰等,2012)。

总的来看,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降低企业从银行贷款时产生的运输、信息和监督成本,并有利于银行加强对企业的风险控制(DeYoung 等,2008;Agarwal 和 Hauswald,2010;Hollander 和 Verriest,2016;陶锋等,2017;蔡庆丰等,2020),由此推进银企双方信贷关系的建立、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而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意味着资金断裂风险的降低,并有助于企业成长、进一步增强融资能力。因此,银行竞争有利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来降低企业失信的风险。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探究了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却易被忽视的议题,即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对社会信用的影响,有助于丰富金融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亦是对社会信用相关文献的重要补充。第二,从理论层面上揭示了银行竞争影响社会信用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三,为量化评估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力争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启示。

① 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界定及具体惩戒措施请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以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② 例如,银监会于 2006 年 2 月颁布《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于 2009 年 4 月颁布《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由此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条件得以大幅放宽。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金融地理结构指的是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与供给(蔡庆丰等,2020)。根据货币非中性理论,资金在地理空间上的替代性和流动性是有限的,区域间金融系统的信贷分配效率差异显著(Klagge 和 Martin,2005),金融地理结构会对微观市场主体产生异质性影响(陶锋等,2017)。因此本文在金融地理结构视角下,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考察银行竞争程度,在微观企业信用层面探究其对社会信用的影响。在中国,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程度具有合理性:中国是典型的、“加强版”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金融地理结构基本上可以由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决定(蔡庆丰等,2020);且由于中国辖区行政壁垒和商业银行总分行制会影响信贷资源跨区域流动,银行间及其与企业的区域位置依然是影响企业信贷资源获取的最重要因素;既有研究(蔡庆丰等,2020;李志生等,2020;张伟俊等,2021)亦采用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刻画银行竞争。具体来说,银行竞争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进而影响企业信用。

(一)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

本文从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风险控制四个方面阐述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第一,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有助于降低资金需求者的运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资金需求者的运输成本指的是企业在寻求合适的金融产品时发生的搜寻成本,包括与银行现场接洽和沟通而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等(Agarwal 和 Hauswald,2010)。随着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这项成本会有所减少。第二,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能够降低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金融信息可分为“硬”信息和“软”信息两类:前者主要通过第三方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方式获取,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远距离获取“硬”信息的效率(陶锋等,2017);而后者这种非标准化信息则主要通过长期、面对面的接触获取,且在银行信贷投放中至关重要(Hollander 和 Verriest,2016)。因此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能够使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缓解,“软”信息传递质量有所提高、信息成本得以降低,从而提升企业外部融资能力。第三,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能够降低银行的监督成本,降低银行对企业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的费用(蔡庆丰等,2020),进而促进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第四,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还有助于减少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强化银行对企业的信用风险控制,促进企业融资。这是因为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能够提高资金借贷双方现场沟通的频率,帮助银行搜集关于借款企业资质状况的高质量信息(DeYoung 等,2008),而且由于受到近距离银行的监督,借款企业在贷款后也会注意信贷资金的使用,降低将其用于私人消费或其他非契约规定的高风险投资活动的可能性(Presbitero 和 Rabellotti,2014)。综上,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即银行竞争程度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二)企业融资与社会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包含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个层面(Osei-Bryson 和 Ko,2004)。本文聚焦于微观层面,以企业信用反映社会信用。企业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信用指的是企业“诚信和信誉的总体评价”,包括企业对债务按期偿还、各种法律和道德承诺的履行;狭义的企业信用指的是企业在到期日对债务按照约定还本和付息的能力和意愿(赵驰等,2012)。本文探讨的企业信用为狭义层面,企业失信指的是企业在债务到期日资不抵债、不具有偿还本息的能力,即成为“老赖”。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如何影响信用水平?本文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两个角度进

行分析。

首先分析直接效应。如前文所述,银行竞争有助于降低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外源融资成本,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企业融资能力增强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降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意味着企业在债务到期日如约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有所提升。因此,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降低自身因资不抵债而成为“老赖”的概率。其次分析间接效应。融资能力对于企业成长是极其重要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经验证据均指出,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有助于促进企业成长、增强经营实力,并主要围绕企业融资对生产率(Gatti 和 Love, 2008)、创新能力(鞠晓生等, 2013)以及国际化行为(阳佳余, 2012)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探讨。而经营实力较强的企业往往在财务和市场等“硬”信息表现上比较透明,具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押品,因而更易受到银行的“青睐”、从银行成功获取外部贷款。由此企业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在债务到期日不能如约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概率大大减少,即直接效应得以强化。因此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降低企业失信概率,增强社会信用。

综合上述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企业融资与社会信用两个方面的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说和推论。

假说:银行竞争有助于降低企业失信概率,增强社会信用,优化营商环境。

推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是银行竞争增强社会信用的微观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与样本处理

本研究有三个主要的数据来源。第一个是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来源是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全国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信息。在银保监会官网上,发布了自 1949 年以来的全国 20 多万家各类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详细的金融许可证信息,包括金融机构名称、机构编码、批准成立日期及地址等。据此可获知银行地理位置信息,同时运用百度地图 API 地理坐标匹配系统,可以得到每家银行具体的经纬度数据。基于这一数据,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地理位置信息,可统计得到企业周边一定半径范围内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第二个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开通的“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据此可获知企业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企业。基于这一数据,可通过失信被执行人名称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单位名称进行匹配,并进行手工完善与补充,识别企业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第三个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涵盖了历年 300 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30 多个行业的工业企业。借鉴 Brandt 等(2012)的研究,本文对该套数据进行了清洗工作。同时囿于数据获取能力,本文最终研究样本包含 2001—2013 年的 755620 家工业企业。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探究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并考察其他影响企业信用的因素,本文构建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设定如下模型:

$$Deadbeat_{it} = \alpha_0 + \alpha_1 (Bank_3/Bank_5/Bank_10)_{it} + \lambda X_{it} + \varphi_c + \psi_j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Deadbeat_{it}$ 为二元虚拟变量,若企业 i 在考察年份 t 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以此衡量企业信用水平,某地区“老赖”越少,社会信用水平越高。目前,采

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失信被执行人数据来考察企业失信行为的研究数量较少。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是以失信被执行人密度(失信被执行人数量与地区总人口或行政区划面积比值)考察社会失信环境(戴亦一等,2019;余泳泽等,2020)。而本文聚焦于企业微观行为,因此设置企业失信与否的二元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展开研究。

核心解释变量为衡量银行竞争的 *Bank_3*、*Bank_5*、*Bank_10* 变量,分别代表企业周边 3 公里、5 公里、1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如前文所述,中国金融地理结构基本上由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决定,而商业银行网点布局反映了银行竞争程度,因而本文借鉴既有研究(蔡庆丰等,2020;李志生等,2020;张伟俊等,2021)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程度。而且由外生的企业地理位置为统计基础,较大程度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李志生等,2020),此外本文还采用其他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详见下文分析。

式(1)中, X 为影响企业信用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企业层面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资产收益率(*ROA*)。同时包括地区层面变量:反映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市场化指数(*Market*)和反映地区企业集聚程度的多样化集聚指标(*Div*)。此外,式(1)中 φ_c 、 ψ_j 和 μ_t 分别代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行业(GB/T 二分位码)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描述性统计

以上变量的符号、测度方法以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分析发现:*Deadbeat* 变量均值为 0.071,意味着平均来说每 1000 家企业中有 71 个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Bank_3*、*Bank_5* 和 *Bank_10* 的均值分别为 1.101、1.595 和 2.377,说明随着考察半径范围的扩大,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逐渐增多,这也符合预期。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i>Deadbeat</i>	1 表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0 表示非失信被执行人	0.071	0.257
自变量	<i>Bank_3</i>	企业 3 公里半径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加 1 并取对数	1.101	1.172
	<i>Bank_5</i>	企业 5 公里半径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加 1 并取对数	1.595	1.377
	<i>Bank_10</i>	企业 10 公里半径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加 1 并取对数	2.377	1.580
控制变量	<i>Size</i>	员工人数并取对数	4.893	1.073
	<i>Age</i>	“考察年份 - 成立年份 + 1”并取对数	1.993	0.780
	<i>TFP</i>	固定效应测度方法	5.748	0.873
	<i>ROA</i>	企业利润与总资产比值	0.117	0.204
	<i>Market</i>	王小鲁等(2017)与樊纲等(2011)市场化指数整合数据	6.665	1.530
	<i>Div</i>	Duranton 和 Puga(2004)的测度方法	0.969	0.043

注:王小鲁等(2017)与樊纲等(2011)测算的市场化指数于 2008 年前后并不统一。本文采用同一年份以上两版市场化指数均值作为折算系数,据此按照统一标准测算得到 2001—2013 年市场化指数,作为本文研究所用数据。

为了初步揭示银行竞争与企业信用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企业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将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而比较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组间差异(见表 2)。在三种考察半径范围内,相比失信被执行人组,非失信被执行人组企业样本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均值更大,说明银行竞争与企业信用呈现正相关关系。此外,本文测算了各省份和直辖市层面反映企业失信和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

Deadbeat、*Bank_5* 指标均值,绘制散点图。^① 分析发现:总体来说,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亦符合表 2 分析结论,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下文中,本文将进一步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信用的因素并克服内生性问题,构建计量模型深入探究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

表 2 关键变量组间均值差异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	差异
<i>Bank_3</i>	1. 107	1. 023	0. 084 ***
<i>Bank_5</i>	1. 607	1. 500	0. 107 ***
<i>Bank_10</i>	2. 392	2. 248	0. 144 ***

注:***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于前文 Probit 模型估计得到的银行竞争影响企业信用的影响效应。核心自变量 *Bank_3*、*Bank_5* 和 *Bank_10* 的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周围 3 公里、5 公里和 10 公里半径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有助于降低企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概率,即银行竞争有助于增强企业信用,本文研究假说得以验证。具体分析可知,*Bank_3*、*Bank_5* 和 *Bank_10*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085、-0. 0078 和 -0. 0070。这一方面说明考察半径范围越小即银行与企业地理距离越短,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促进效果越为明显;另一方面以 *Bank_3* 估计结果 (-0. 0085) 为例并结合表 1 中其标准差 (1. 172) 分析可知,企业周边 3 公里半径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数值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概率下降约 0. 010 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 (0. 071) 的 14. 0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i>Deadbeat</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i>Bank_3</i>	-0. 0085 *** (0. 0010)		
<i>Bank_5</i>		-0. 0078 *** (0. 0008)	
<i>Bank_10</i>			-0. 0070 *** (0. 0009)
<i>Size</i>	0. 0887 *** (0. 0011)	0. 0889 *** (0. 0011)	0. 0888 *** (0. 0011)
<i>Age</i>	-0. 0936 *** (0. 0015)	-0. 0934 *** (0. 0015)	-0. 0941 *** (0. 0015)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汇报散点图结果,留存备案。

续表 3

	(1) <i>Deadbeat</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i>TFP</i>	-0.2877 *** (0.0159)	-0.2869 *** (0.0159)	-0.2870 *** (0.0159)
<i>ROA</i>	-0.3529 *** (0.0065)	-0.3561 *** (0.0066)	-0.3540 *** (0.0065)
<i>Market</i>	-0.0227 *** (0.0029)	-0.0222 *** (0.0029)	-0.0225 *** (0.0029)
<i>Div</i>	-0.3461 *** (0.0294)	-0.3421 *** (0.0294)	-0.3456 *** (0.0294)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63933	3063933	3063933
Pseudo R ²	0.0339	0.0339	0.033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调整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具有两个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社会信用水平较高往往会吸引较多银行入驻，有较多的银行机构建立在信用较好的企业周围，即银行内生选址问题；二是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可能与未观测到的经济特征有关。

为了克服上述第一个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实证估计，并选取如下两个工具变量：历年每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均值，以及借鉴许和连等(2020)的做法采用1984年城市银行密度(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城市地理面积比值)与年份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第一个是较为常用的工具变量测度方法，采用第二个工具变量的原因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性业务正式剥离出来，且1984年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许和连等,2020)，因此当时银行在某地成立分支机构与否受到企业自身融资需求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设置条件。表4估计结果显示，克服内生性问题后银行竞争仍有利于降低企业失信概率、增强社会信用，前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且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实了其选取的合理性。

表 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均值			1984 年城市银行密度与年份乘积		
	(1)	(2)	(3)	(4)	(5)	(6)
<i>Bank_3</i>	-0.0113 *** (0.0003)			-0.3699 *** (0.0138)		
<i>Bank_5</i>		-0.0096 *** (0.0002)			-0.2026 *** (0.0054)	
<i>Bank_10</i>			-0.0081 *** (0.0001)			-0.1346 *** (0.0030)

续表 4

	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均值			1984 年城市银行密度与年份乘积		
	(1)	(2)	(3)	(4)	(5)	(6)
样本量	3063933	3063933	3063933	2275383	2275383	2275383
Uncentered R ²	0. 0749	0. 0753	0. 0760	- 2. 6281	- 1. 0138	- 0. 5133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4. 5e + 05 [0. 0000]	5. 7e + 05 [0. 0000]	6. 9e + 05 [0. 0000]	894. 265 [0. 0000]	2339. 575 [0. 0000]	4444. 408 [0.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9. 2e + 05 { 16. 38 }	1. 5e + 06 { 16. 38 }	2. 8e + 06 { 16. 38 }	879. 163 { 16. 38 }	2234. 620 { 16. 38 }	4029. 541 { 16. 38 }

注:表中估计包含前文所述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为了尽可能排除由不可观测因素干扰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张伟俊等(2021)的做法构建地理边界断点回归(Boundary Discontinuity, BD)模型再次进行实证估计。采用该模型主要是为了排除地理特征对银行选址和企业绩效的干扰。地理位置上距离城市边界较近的企业,往往面临较小的交通和地价成本等优势条件,这在吸引其他企业入驻的同时亦能吸引银行网点选址于该区域,进而影响企业融资和信用水平。因此,本文构建以地理上边界为断点的 BD 模型以期排除地理特征引起的混杂因素干扰,解决由此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保留距离地理边界(地级及以上城市)一定范围内(3 公里、5 公里、10 公里)的企业样本,^①据此展开实证估计。表 5 汇报的结果显示, *Bank_10*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即银行竞争有利于增强企业信用。

表 5 地理边界模型估计结果

	3 公里以内		5 公里以内		10 公里以内	
	(1)	(2)	(3)	(4)	(5)	(6)
<i>Bank_10</i>	-0. 0911 *** (0. 0119)	-0. 0791 *** (0. 0104)	-0. 1657 *** (0. 0249)	-0. 2130 *** (0. 0470)	-0. 2135 *** (0. 0395)	-0. 2805 *** (0. 0527)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23355	218639	425824	417222	931152	931139

注:限于篇幅,此处以 *Bank_10* 变量衡量银行竞争为例进行实证估计,原因是由前文分析可知考察半径范围越大,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促进效果越弱,如若以该变量衡量银行竞争时估计结论符合预期,则更可体现本文研究假说的稳健性。以其他银行竞争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的估计结果留存备案。

(三)稳健性检验

1. 变更核心变量测度方法

金融供给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既体现在某区域企业之间,也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上文从前者视角考察金融地理结构和银行竞争,这一部分本文变更银行竞争测度方法,以期从后者视角刻画银行竞争,再次进行实证估计以期体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① 与地理边界的距离采用最短距离,大致的测算方法是根据每一家企业经纬度计算其相对所在城市边界多边形的距离集合,由此选择最短距离,更为详细的说明可见 Lu 等(2019)的研究。

具体来说,借鉴陶锋等(2017)的做法,构建金融集聚度(Fin_agg)和金融中心溢出效应(Fin_centre)指标衡量城市本地和不同城市间的金融供给地理结构。测度方法是: $Fin_agg_{ct} = Fin_{ct}/Area_{ct}$,即 t 年企业所在城市 c 的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in_{ct})与当年城市地理面积($Area_{ct}$)的比值; $Fin_centre_{ct} = Fin_{ct}/(Dist_m \times Area_{ct})$,其中 $Dist_m$ 代表非省会城市 c 距离其所在省份省会城市 m 的空间距离,因此在考察金融中心溢出效应时研究样本为非省会地级市。金融机构贷款反映了城市金融活动规模,因而上述变量亦反映了城市金融发展和银行竞争程度。估计结果详见表 6。分析发现: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结果均为负数,但当同时引入上述变量且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金融中心溢出效应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从不同区域角度考察金融地理结构,同样能够得到银行竞争有助于降低企业成为“老赖”概率的结论,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但金融中心对省内其他城市企业信用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本文认为这或许是由此处考察的地理范围为省城层面范围较大所致。

表 6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1) <i>Deadbeat</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4) <i>Deadbeat</i>
<i>Fin_agg</i>	-0.0033 *** (0.0001)		-0.0031 *** (0.0004)	-0.0064 *** (0.0004)
<i>Fin_centre</i>		-0.0895 *** (0.0137)	-0.1543 *** (0.0388)	-0.0102 (0.0371)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870646	2195872	2234925	2195872
R ²	0.0305	0.0290	0.0015	0.0143

2. 变更实证估计方法

虽然银行竞争能够降低企业失信概率,增强社会信用,但也有可能对企业信用产生消极影响。银行业过度竞争可能导致银行投资高风险项目以争夺市场份额,赢得高利润,这将导致无序的恶性竞争,甚至降低银行业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姜付秀等,2019),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向银行借款是最为廉价和便捷的外源融资方式(孙灵燕、李荣林,2011),因此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将导致企业无法获取稳定的外部融资渠道,进而增加其资不抵债带来的失信风险。因而此处本文借鉴 Hirano 和 Imbens(2004)提出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模型再次进行实证估计。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是:它不仅能够量化估计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效应,还能测度其异质影响,构建“反事实”情形量化探究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作用效果的连续性、是否存在拐点等;同时通过控制特征变量能够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

本文 GPS 模型设置中处理变量、结果变量分别为银行竞争、企业信用指标。具体来说,借鉴既有研究(戴静等,2020)采用银行市场份额($CR5$)指标反映银行业竞争度,测度方法是: $CR5 = 1 - N_5/N$,其中 N_5 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 N 代表地区内全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CR5$ 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银行业竞争度越高。同时从地区层面衡量社会信用,借鉴余泳泽等(2020)的做法,以地级及以上城市失信企业数量占地区内企业总数的比值($Deadbeat_r$),衡量地区信用水平。

图 1 汇报了 GPS 模型估计的核心结果,即银行竞争程度不同百分位水平下对地区失信企业比例的因果效应函数。^① 在某阈值之前,CR5 指数与失信企业比例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银行竞争能够减少失信企业比例,增强社会信用,体现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但超过这一阈值后,银行业竞争度越高,地区失信企业比例越大。这表明若要充分发挥银行竞争对企业信用的促进作用,需把握银行竞争的最优作用区间,防止银行网点无序扩张和扎堆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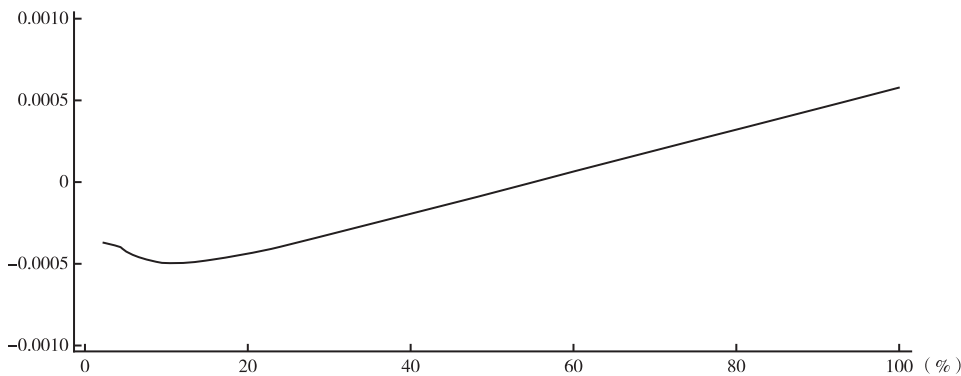


图 1 银行竞争不同百分位(横坐标)下对地区失信企业比例(纵坐标)的因果效应函数

(四)异质性分析

在银行信贷配给过程中,存在“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问题。前者指的是大规模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押品,在财务和市场等“硬”信息方面更为充分和透明(Guiso 等,2004),其借款往往被认为是“刚兑”资产(蔡庆丰等,2020),因而更容易受到银行青睐而获得贷款;后者指的是国有企业借款会被认为具有政府信用背书和隐性担保,而更容易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那么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是否能够克服上述歧视现象,即更有利于缓解中小微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增强这类企业的信用呢?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本文在证实前文研究假说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类,据此再次展开实证估计。

1. 区分企业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企业规模的界定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两大类:员工人数超过 1000 人的大规模企业,人数小于等于 1000 人的中小微规模企业。^② 表 7 第(1)、(2)列估计结果表明,不同规模类型企业均能够通过银行竞争降低失信风险。此外,从相同半径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不同规模企业信用的影响效应来看,银行竞争对大规模企业信用的促进效应更大。这说明在研究样本期内银行竞争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规模歧视”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竞争对缓解这一问题毫无帮助,因为中小微规模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本就具有一定劣势:相比“结构性障碍(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是一个更具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张杰等,2013),中小微规模企业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都更大;而且中小微规模企业更容易出现贷款的不良记录,这易引发“柠檬市场”问题,使其陷入外部融资困境。因此,究竟银行竞争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汇报 GPS 模型第一步和第二部参数估计结果,留存备案。

② 中小微规模企业中,人数介于 300 和 1000 人之间、介于 20 和 300 人之间、小于 20 人的分别为中型、小型、微型规模企业。

“规模歧视”，是值得作者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探究的问题。

2. 区分企业所有制

根据企业所有制不同,将样本划分为三类,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划分依据为三类资本各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是否为 100%。表 7 中第(3)~(5)列估计结果显示:当考察企业周边 3 公里或 5 公里半径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影响时,核心变量估计结果均为负;当考察 10 公里半径范围时,*Bank_10* 变量的估计系数只有基于民营企业样本估计时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且为负。这表明银行竞争更大程度地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从而增强了其信用。银行竞争较好地克服了中国银企借贷关系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民营企业通过银行竞争,其外部融资能力能够获得更为显著的提升,要素资源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再配置(戴静等,2020)。本文间接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以更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

表 7 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1) 大规模	(2) 中小微	(3) 国有	(4) 外资	(5) 民营
<i>Bank_3</i>	-0.0246 *** (0.0052)	-0.0068 *** (0.0010)	-0.0204 *** (0.0075)	-0.0195 *** (0.0061)	-0.0222 *** (0.0011)
样本量	111495	2952421	88215	158531	1184038
Pseudo R ²	0.0537	0.0350	0.0751	0.0437	0.0383
<i>Bank_5</i>	-0.0198 *** (0.0046)	-0.0056 *** (0.0009)	-0.0119 * (0.0061)	-0.0104 * (0.0055)	-0.0159 *** (0.0015)
样本量	111495	2952421	88215	158531	1184038
Pseudo R ²	0.0536	0.0350	0.0749	0.0437	0.0378
<i>Bank_10</i>	-0.0185 *** (0.0042)	-0.0067 *** (0.0008)	0.0001 (0.0066)	-0.0045 (0.0051)	-0.0155 *** (0.0013)
样本量	111495	2952421	88215	158531	1184038
Pseudo R ²	0.0536	0.0350	0.0749	0.0437	0.0379

注:表中估计包含前文所述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留存备索。下同。

五、影响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在前文证实本文研究假说的基础上,此处旨在检验研究推论,即银行竞争是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其信用。具体借鉴 Hadlock 和 Pierce(2010)的研究,采用 SA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能力: $SA = -0.737 \times Size + 0.443 \times Size^2 - 0.04 \times Age$ 。其中,*Size*、*Age* 分别代表企业规模(资产水平)和年龄。该指数计算结果为负值,且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为严重,因此本文在计量方程中纳入 *sa* 变量(SA 指数计算结果取负数)以便分析估计结果。构建计量模型时本文借鉴许和连等(2020)检验影响机制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考察银行竞争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以及企业融资对自身信用的影响,估计结果详见表 8 第(1)、(2)列。*Bank_5*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sa*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

为严重、其成为“老赖”的概率越大,即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增强自身信用。至此,本文研究推论得以验证。

另一方面以 *sa* 变量均值为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定义二元虚拟变量 *sa_g*:大于均值的企业样本为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组,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进而将银行竞争变量与 *sa_g* 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8 第(3)列:银行竞争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对企业失信的缓解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组较为明显,即银行竞争较有利于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降低失信概率,这亦验证了本文研究推论。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1) <i>sa</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i>Bank_5</i>	-0.0016 *** (3.21e-05)	-0.0059 *** (0.0020)	<i>Bank_5</i>	-0.0068 *** (0.0026)
<i>sa</i>		0.7354 *** (0.0377)	<i>Bank_5</i> × <i>sa_g</i>	-0.0224 *** (0.0029)
			<i>sa_g</i>	0.1067 *** (0.0078)
R ²	0.9617			
样本量	3063933	3063933	样本量	3063933
Pseudo R ²		0.0351	Pseudo R ²	0.0342

注:以 *Bank_3* 和 *Bank_10* 变量衡量银行竞争对应的研究结论并不改变,限于篇幅未在正文汇报,估计结果留存备案。下同。

(二)拓展分析

1. 社会信用:文化的作用

相比法律法规、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样是影响社会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国家出台相关法规政策鼓励银行业竞争是通过“正式制度”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那么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对社会信用的作用如何?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本文以儒家文化衡量“非正式制度”,考察其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力量(Ip, 2009),中国企业家价值观中有很多儒家思想的渗透。例如,“信”是儒家思想之精髓,也是儒家倡导的处事原则。“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倾向于以诚信为准则,立足于信用机制。本文认为在儒家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的概率会有所降低。

具体来说,借鉴 Du(2015)的做法以企业周边 100 公里、200 公里和 300 公里半径范围内遗存孔庙的数量衡量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分别设置 *Kongmiao_100*、*Kongmiao_200* 和 *Kongmiao_300* 变量,并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为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提供的中国文化研究数据库,由《中国书院辞典》获取孔庙所在省市县信息,通过孔庙坐落地址和企业所在地经纬度信息,并利用百度地图 API 地理坐标匹配系统测算得到二者的地理距离。企业周边孔庙数量越多,表明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表 9 第(1)~(3)列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预期: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越为浓厚的地区企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概率越低,儒家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同样是增强社会信用、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

2. 银行竞争对商业信用的影响

作为企业间的贷款延迟支付,商业信用是在卖方允许买方获得货物后不立即支付货款,而是延迟一段时间再支付的短期融资方式(张杰等,2013),是中国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根据替代性融资理论,商业信用的大量存在主要源自信贷配给,即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企业会求助供应商(商业信用债权人)进行融资(Petersen 和 Rajan,1997)。根据买方市场理论,商业信用的大量存在主要是因为买方强势,供应商为了促使产品尽快销售而愿意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陆正飞、杨德明,2011)。为了考察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衡量商业信用的指标,进而考察银行竞争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具体来说,参考张杰等(2013)的做法,以企业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Credit*)衡量商业信用。同时分别构建预收账款与总资产比例、应付账款与总资产比例指标,前者 and 后者分别是从供给方(债权人)和需求方(债务人)的角度衡量商业信用。本文设置 *Difference* 变量衡量二者的差值。表 9 第(4)列估计结果显示,银行竞争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竞争有助于增强商业信用。表 9 第(5)列估计结果说明,银行竞争能够促进贷款企业成为商业信用的净提供者,因而本文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商业信用渠道缓解了其他资金需求企业的融资困境。

3. 银行竞争对金融负债的影响

此外,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 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否影响自身债务决策。根据“市场力量假说”,银行竞争有助于提高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而中国企业债务融资的主要来源便是银行信贷,因而银行竞争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债务融资供给端条件的改善,这有利于提升企业杠杆率和负债水平。然而,企业杠杆率提高并不意味着负债水平更加合理。相比自身实际杠杆率大于目标杠杆率的过度负债企业来说,只有银行竞争使实际杠杆率小于目标杠杆率、自身融资不足的企业杠杆率水平得以显著提升,才能够说明银行竞争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以企业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测度企业杠杆率(*Lev_ratio*),并借鉴蔡庆丰等(2020)、李志生等(2020)的做法以企业实际杠杆率与目标杠杆率之差衡量企业过度负债率,由此设置二元虚拟变量 *Lev_over*:过度负债率为正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进而构建计量模型,考察前文所述银行竞争变量、企业过度负债 *Lev_over* 变量及其二者的交互项对企业杠杆率 *Lev_ratio* 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9 第(6)、(7)列。分析发现,*Bank_5*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竞争有助于提高企业杠杆率和负债水平。此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比过度负债的企业,银行竞争显著提升了非过度负债即融资相对不足企业的杠杆率,说明银行竞争是 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

表 9 拓展分析估计结果

	(1) <i>Deadbeat</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4) <i>Credit</i>	(5) <i>Difference</i>	(6) <i>Lev_ratio</i>	(7) <i>Lev_ratio</i>
<i>Bank_5</i>	-0.0043 *** (0.0009)	-0.0065 *** (0.0009)	-0.0070 *** (0.0009)	0.0061 *** (0.0010)	0.0016 *** (0.0004)	0.0012 *** (0.0002)	0.0013 *** (0.0002)
<i>Kongmiao_100</i>	-0.1092 *** (0.0021)						
<i>Kongmiao_200</i>		-0.0388 *** (0.0023)					

续表 9

	(1) <i>Deadbeat</i>	(2) <i>Deadbeat</i>	(3) <i>Deadbeat</i>	(4) <i>Credit</i>	(5) <i>Difference</i>	(6) <i>Lev_ratio</i>	(7) <i>Lev_ratio</i>
<i>Kongmiao_300</i>			- 0. 0374 *** (0. 0025)				
<i>Bank_5 × Lev_over</i>							- 0. 0047 *** (0. 0004)
<i>Lev_over</i>							- 0. 4262 *** (0. 0708)
样本量	3060428	3060428	3060428	2438531	2438531	2221283	831755
Pseudo R ²	0. 0357	0. 0341	0. 0340	0. 0014	0. 0076	0. 2638	0. 5408

六、结论与启示

营商环境是中国“十四五”时期参与全球存量竞争的重要领域,其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出发,基于微观层面探究银行竞争对社会信用的影响。首先,本文揭示了银行竞争通过企业融资能力影响企业信用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研究假说和推论:银行竞争有助于增强企业信用,且企业融资能力增强是银行竞争促进企业信用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变更核心变量测度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并不改变。上述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分析表明,儒家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同样有助于增强企业信用,这间接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来自增强社会信用方面的经验证据。银行业竞争亦有助于促进商业信用,提升企业金融负债能力。

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有两点。第一,推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有助于增强社会信用,优化营商环境。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优化银行网点布局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需要防止银行业过度竞争,制止网点无序扩张和扎堆设立,以期最大限度发挥这种正外部性。第二,优化信贷资源分配结构,缓解金融错配问题。本文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对民营企业信用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大。这说明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现象有所缓解,经济发展中应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信贷资源分配结构的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庆丰、陈熠辉、林焜:《信贷资源可得性与企业创新:激励还是抑制?——基于银行网点数据和金融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2. 陈颐:《儒家文化、社会信任与普惠金融》,《财贸经济》2017 年第 4 期。

3. 戴静、杨笋、刘贯春、许传华:《银行业竞争、创新资源配置和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20 年第 2 期。

4. 戴亦一、张鹏东、潘越:《老赖越多、贷款越难?——来自地区诚信水平与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证据》,《金融研究》2019 年第 8 期。

5.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 年第 9 期。

6. 姜付秀、蔡文婧、蔡欣妮、李行天:《银行竞争的微观效应:来自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 年第 6 期。

7. 鞠晓生、卢荻、虞义华:《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 期。

8. 李志生、金陵、孔东民：《分支机构空间分布、银行竞争与企业债务决策》，《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9. 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
10. 吕朝凤、陈汉鹏、L. L. Santos：《社会信任、不完全契约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11. 孙灵燕、李荣林：《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12. 陶锋、胡军、李诗田、韦锦祥：《金融地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兼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
13. 王小鲁、樊纲、余文静：《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4. 许和连、金友森、王海成：《银企距离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15. 阳佳余：《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4期。
16. 余泳泽、郭梦华、胡山：《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9期。
17. 张杰、刘元春、翟福昕、芦哲：《银行歧视、商业信用与企业发展》，《世界经济》2013年第9期。
18. 张伟俊、袁凯彬、李万利：《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21年第6期。
19. 赵驰、周勤、汪建：《信用倾向、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成长——基于长三角工业企业的实证》，《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9期。
20. Agarwal, S. , & Hauswald, R. , Distance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in Lend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No. 7, 2010, pp. 2757 – 2788.
21. Brandt, L. , Van Biesebroeck, J. , & Zhang, Y. ,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7, No. 2, 2012, pp. 339 – 351.
22. DeYoung, R. , Glennon, D. , & Nigro, P. , Borrower-Lender Distance, Credit Scoring, and Loa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formation-Opaque Small Business Borrow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17, No. 1, 2008, pp. 113 – 143.
23. Du, X. ,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132, No. 4, 2015, pp. 661 – 716.
24. Duranton, G. , & Puga, D. ,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Herdenson, J. V. , & Thisse, J. F. (eds.)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North-Holland, 2004.
25. Gatti, R. , & Love, I. , Does Access to Credit Improve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Bulgari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6, No. 3, 2008, pp. 445 – 465.
26. Guiso, L. , Sapienza, P. , & Zingales, L. , 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3, 2004, pp. 929 – 969.
27. Gupta, A. , Raman, K. , & Shang, C. ,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87, 2018, pp. 102 – 117.
28. Hadlock, C. J. , & Pierce, J. R. ,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No. 5, 2010, pp. 1909 – 1940.
29. Helliwell, J. ,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Vol. 20, No. 2, 2003, pp. 331 – 360.
30. Hirano, K. , & Imbens, G. W. , The Propensity Score with Continuous Treatments. In Gelman, A. , & Meng, X. L. (eds.) , *Applied Bayesian Model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from Incomplete-data Perspective*, John Wiley & Sons, 2004.
31. Hollander, S. , & Verriest, A. , Bridging the Gap: The Design of Bank Loan Contracts and Dist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19, No. 2, 2016, pp. 399 – 419.
32. Ip, P. K. , Is Confucianism Good for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88, No. 3, 2009, pp. 463 – 476.
33. Klagge, B. , & Martin, R. , Decentralized versus Centralized Financial Systems: Is There a Case for Local Capital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5, No. 4, 2005, pp. 387 – 421.
34. Knack, S. , & Keefer, P. ,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No. 4, 1997, pp. 1251 – 1288.
35. La Porta, R. , Florencio, L. , Shleifer, A. , & Vishny, R. ,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1997, pp. 333 – 338.

36. Lu, Y. , Wang, J. , & Zhu, L. , Do Place-Based Policies Work?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 11 , No. 3 , 2019 , pp. 325 – 360.
37. Osei-Bryson, K. M. , & Ko, M. ,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s and Firm Performance Using Regression Splines Analy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 42 , No. 1 , 2004 , pp. 1 – 13.
38. Petersen, M. , & Rajan, G. R. , Trade Credit: Theories and Evide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10 , No. 3 , 1997 , pp. 661 – 691.
39. Presbitero, A. F. , & Rabellotti, R. ,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Moral Hazard in Microcredit: Evidence from Colo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6 , No. 1 , 2014 , pp. 91 – 108.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Finance, Bank Competi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ranche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Blacklisted Firms

DAI Meiho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16025)

Abstract: As China works to 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pays growing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which building a sound social credit system is vital. But few papers investigate the bank competition's impact on social cre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fin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businesses with a poor credit score at the micro level. First, it explains theoretically the impact of bank competition on firms' credit.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empirically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China during 2001 – 2013: bank competition helps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irms turning to defaulter, and improve their credit instead by easing the credit constraints on the firm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holds after altering the measurement of key variables and addressing the endogeneity issue. Moreover, results of heterogeneous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bank competition on corporate credi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large firms and private firms. Results of extensiv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Confucius culture, also help improve corporate credit; bank competition helps improve commercial credit and firms' capacity of financial liabili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micro-level evidence for the financi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fers new insights for building a better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words: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Finance, Bank Competition, Social Credit, Firm, Business Environment

JEL: G20, D22, R38

责任编辑:诗 华